

论段玉裁学术文化的独特性

王华宝

内容提要 清代段玉裁以学术名世,既是著名的语言学家、经学家,也是文献学家、思想家,其学术成就与治学理念为世人所赞仰。前人已从专书专题、学术思想、文化成就等不同方面探讨段氏学问、段学传承、研究理路。然从独创性的学术成果、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以及独特的学术实践三个方面探讨,更能揭示段玉裁独特的学术个性、文化精神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。

关键词 段玉裁 乾嘉学派 《说文解字注》《六书音均表》

王华宝,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东南大学古文献学研究所所长 211197

江苏金坛段玉裁(1735-1815)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,有“一代朴学宗师”之称。用现代学术观念评价,段氏既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语言学家、经学家,也是文献学家、思想家。李开评论说,在语言世界内,“段玉裁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中国学术故事”^[1]。而学界在评说段玉裁时,常用开创性、突破性、独创而系统、独树一帜等修饰,可见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、所作出的文化贡献与独创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前人已从专书专题、学术思想、文化成就等不同方面探讨段氏学问、段学传承、研究理路,这里进一步从段玉裁独创性的学术成果、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以及独特的学术实践三个方面进行探讨,以揭示其独特的学术个性、文化精神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。

一、独创性的学术成果

段玉裁著有《说文解字注》《六书音均表》《古文尚书撰异》《诗经小学》《周礼汉读考》《仪礼汉读考》《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》《经韵楼集》等近三十部书,七百余卷,学术成果丰硕,内容涉及中国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校勘学、经学、学术思想等众多方面^[2]。阮元指出,段氏成果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

本文为东南大学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”《段玉裁年谱长编》阶段性成果。

[1]李开:《丰硕的成果——段玉裁诞辰280周年纪念暨段学、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成果述要》,《宏德学刊》第五辑,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,第5页。

[2]详参拙稿:《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》,《宏德学刊》第一辑,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。

面：“言古音一也，言《说文》二也，汉读考三也。”^[1]学术精品的基本要求必然是独创性，没有创新性就必然不会有学术的生命力。前修与时贤在不断探讨着段氏作品的贡献与独创性。

文字学方面，《说文解字注》最负盛名，当时即得学术大师王念孙赞誉“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也”。卢文弨也说“盖自有《说文》以来，未有善于此书者”，“非独为叔重氏之功臣，抑亦以得道德之指归，政治之纲纪”。今人许嘉璐评价说：“是其时诸家皆据己之所长以论段书，于是各赞其一端；然段之为注，实乃覆畴近世诸多学科矣，非一言可得槩括，唯合上述诸家之评鹭，乃得约略得窥段氏之苦心。故读《说文》必自段氏注始，探研古之语言文字，常以段说为导引。段氏之功，巨矣！”^[2]

音韵学方面，竺家宁在《论段玉裁在上古音研究的开创性》一文中指出：在音韵研究上，他能够思考到别人没有思考的问题。创立了“谐声表”，成为后世研究上古韵部的楷模。古韵部要如何排列，段玉裁又做了突破性的思考，改变了前人习习相因的“东冬鍾江”顺序，而以“之部”开头。如何决定上古的音近关系，他又做了一项开拓性的思考，利用韵部和韵部之间的例外通押现象，作为观察两部发音亲疏远近关系的依据，建立了他的“古合韵学说”。这种创见，表现在他《六书音均表》中的“合用类分表”中。竺家宁总结说：“我们研究段玉裁在音韵学上的每一项作法，都有突破性的思考。每一个问题，都能提出他个人的真知灼见，而不是像其他学者一样，守着前人的藩篱，成为前代学者的影子而已。段玉裁的这种精神，在今天我们纪念他280周年诞辰的时刻，更应该提出来加以表彰，不但是对段先生的一份纪念，更是作为我们现代学者治学方法、治学态度、治学精神上学习的榜样。”^[3]

鲁国尧在《段玉裁：杰出的中国语言学思想家》一文中举例说：《六书音均表》中尤其值得表彰的是说十八“音韵随时代迁移说”：“今人概曰古韵不同今韵而已。唐虞而下，隋唐而上，其中变更正多，概曰古不同今，尚皮傅之说也。音韵之不同，必论其世。约而言之，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，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，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。古人之文具在，凡音转、音变、四声，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。”这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汉语史分期说，段玉裁将先唐时期的语音史分为三期。这是中国学者独立发明的学理，时在十八世纪的1775年，应该载诸史册^[4]。海峡两岸的著名音韵学家，都高度肯定了段氏发人之所未发的“开创性”学术贡献与文化精神。

经学方面，正、续《清经解》收录段氏《古文尚书撰异》33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30卷，《诗经小学》4卷，《周礼汉读考》6卷，《仪礼汉读考》1卷，《说文解字注》30卷，《六书音均表》5卷，《经韵楼集》6卷，凡115卷。李建国评论说：“无论种类和卷数，均居诸家前列。由是段学亦足以垂示千古矣。”^[5]清代重视朴学，小学被视作通达一切学问的阶梯。而段氏精通小学，“以字考经，以经考字”^[6]，进而融会贯通，博及四部，成其“通学”特征，其学术成果颇受重视。

校勘学方面，段玉裁一生校订古籍数十部，具有丰富的校勘实践，对校勘有着独特的认知，其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，定其是非之难。是非之难有二，曰底本之是非，曰立说之是非”^[7]之说，道出了古籍整理工作艰巨、复杂、长期性的特点，他与另一著名的校勘学家顾千里展开过持久的

[1]阮元：《汉读考周礼六卷序》，《擘经室》一集卷十一，文选楼刊本，1823年版。

[2]王说见所作《说文序》；卢说见《抱经堂文集》卷三《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》；许说见《〈段玉裁全书〉总序》，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。

[3][4]文载《宏德学刊》第五辑，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422-428页，第103页。

[5]《段玉裁的经学进路》，载《宏德学刊》第五辑，第65页。

[6]陈奂：《说文解字注跋》，附于《说文解字注》。

[7]段玉裁：《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》，载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二。《段玉裁全集》之二《经韵楼集》附“补编”“两考”本，〔南京〕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，赵航、薛正兴整理。第313-317页。

学术论争,留下了十多篇校勘文章^[1]。清代学术范式以及段氏的学术理性、知识结构等规定了他的学术追求是“求是”,并在校勘实践中将“求是”精神发挥到极致,不仅讨论“底本之是非”,还要讨论“立说之是非”,导致了他采用“改字”的校勘处理方式。他提出“校书毋凿、毋泥、毋任人,而顺其理”^[2],因此成为“理校”的代表性学者,形成了段玉裁校勘学的特色^[3]。

后人将乾嘉时代的“小学”径称为“段王之学”,已充分肯定了段玉裁和王念孙的学术贡献,尤其是段玉裁,“湛深经史,尤精六书”^[4]。2015年,收入段氏自著作品15种、附录2种,计175卷、近400万字的《段玉裁全书》面世^[5],集段氏传世著作之大成,并召开“段玉裁诞辰280周年纪念暨段学、清学国际研讨会”^[6],同步举行《段玉裁全书》首发式。该书汇集段氏的研究成果,《说文解字注》《古文尚书撰异》等著作本身即是学术创新。只有研读这些作品,探求“段学”形成的历史条件,揭示段氏的学术个性及特殊契机,才能更好地认识段氏著述独创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贡献。

二、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

真正独创性成果的取得,总是与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分不开的。经学为体,小学为用,这是段玉裁与他人的相同之处。而段氏有着明确的“创新”意识。在与友人刘端临的信中说:“今年《说文》稿成百四十页,第九篇已发轫矣。无处不有创获。”^[7]他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强烈的创新、质疑精神,又展示出独特的学术个性。“实事求是”是乾嘉学人的共同旗帜,段玉裁师从朴学大师戴震,宜乎其以“实事求是”作为终生的治学宗旨^[8]。如在段玉裁这里,语言学为经学研究服务,而又相对独立^[9];经学研究以“求是”为学术目标,以“求道”为最终旨归。段氏“校经”,是遵循学术传统,为注释经典,为“明经”扫除障碍。他在《答顾千里书》中明确提出:“夫校经者,将以求其是也,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,此汉人法也。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,不必其有左证。”“凡校书者,欲定其一是,明贤圣之义理于天下万世,非如今之俗子夸博瞻瞻、夸能考核也。”^[10]“求其是”“明义理”,可以说是段氏学术精神之宣言,也规定了段氏的校勘目的必然是“定是非”。

段氏一向标举“学有心得”、“真知”,“余尝以为,学者记所心得,无忘所能,可以自课,可以持赠同人,莫善于是;顾为之者其弊有二:一曰好为异说,一曰剿说雷同,皆中无所得,藉是邀名,自谓知古学而已。闻之东原师曰:知十而皆非真知,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。洞彻其末末,劈剖其是非,核诸群书而无碍,反之吾心而帖然,一字一句之安妥,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。”段玉裁甚至认为,学有心得,可

[1]参见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、卷十二等,段玉裁有《与顾千里书》多篇,《与黄绍武书》、《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》,卷一有《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》,卷五有《与胡孝廉世琦书》等,阐述自己的校勘理论与主张。

[2]见《经义杂记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八,第181-182页。

[3]拙撰:《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》,〔南京〕《东南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4年第3期。

[4]见吴修:《昭代名人尺牍小传》卷二十三,清光绪刻本。

[5]赖永海主编:《段玉裁全书》,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。

[6]2015年8月25日在南京召开,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、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主办,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承办,江苏省语言学会、东南大学古文献学研究所协办。来自中国(含香港、台湾地区)、美国、德国的百余名学者,围绕段学、清学领域的十五个议题展开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与交流。

[7]见《经韵楼文集补编》卷下《与刘端临第二十六书》,第47-48页。

[8]参见拙稿:《段玉裁年谱长编》,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,第11页。

[9]参见李开:《试论段玉裁的学术思想》,段氏“古代语言学”独立于经学之外,是其经学研究的逻辑工具。载《宏德学刊》(第一),第203页。段氏半生注《说文》、一生耽于“小学”文献,做音韵学的专门研究,可知段氏已将“语言学”作为独立的学问来对待。

[10]《经韵楼集》卷十一,第282、283页。

以神交古人与后人,因而可获得超时空的精神愉悦:“夫人有心之处,超乎古人者,必恨古人不我见,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,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,必有善于我者,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。”^[1]

段氏治学强调求精、求工,如此才能“传而能久,久而愈著”:“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,合众艺而精之,殆未之有也。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,无弗习,无弗精,其学固一轨于正,不参以老佛功利之言,其文尤非好为古文以自雄坛坫者比也。中有所见,随意抒写,而皆经史之精液。其理明,故语无鹘突;其气和,故貌不矜张;其书味深,故条鬯而无好尽之失,法古而无摹仿之痕,辩论而无喧嚣攘袂之习。淳古澹泊,非必求工,非必不求工,而知言者必以为工。裨学者可由是以渐通经史以当,逮唐、宋以来诸大家之文,其传而能久,久而愈著者,固可必也。”^[2]

段氏强调创新和突破,崇尚精益求精,最具有科学精神和开拓性。对待每一个问题,他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,当是他的过人之处。学术又必须有反思与质疑精神,学术观点需要有讨论,没有交锋就没有真知。段氏具有“论辩”意识,唯“道”是从,敢于批评和论争。如他曾写信批评身为一省最高长官、后来官居一品的阮元。阮元当时在浙江巡抚任上,办书院,修典籍。段玉裁感到浪费了自己著书立说的时间,不肯做他的幕客,不再为他代做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勘记。后来还写信给阮元,说你为你父亲大人写的“行状”,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。对用“世父”、“舅祖”等词提出不同意见,说不应当用。对“行状”的说法也提出意见,说只有名人才可以用“行状”,子女给父母写的生平事迹,只用“行述”、“述”等^[3]。又如与顾千里持续数年的论争,尽管带有一定的意气之争,而更多的则是学术理念、治学方法等的差异。顾氏看重版本等实证工具的作用,注重文献自身的问题,强调“不校校之”^[4],具有校勘方法与处理方式的的原则价值,与当今古籍整理的校勘原则相合;而段玉裁则重视通过校勘以“明道”,其校正文字是非是为了探讨经籍中所蕴含的义理,使后人不惑,更看重自身的识断能力。段氏的做法,更强调研究基础上的整理,甚至于直抵“立说之是非”,与当今的古籍研究理念更为契合。这与段氏以学问家校读整理古籍也大有关联^[5]。段、顾二人学术背景有所不同,在校勘上各具特色,各有成就,应当说,为校勘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

段玉裁独特的学术个性,又体现在他的理论概括与历史观等方面。段玉裁提出的形音义互求的方法已成为传统小学的铁律。又善于分析归纳,得其义例,《说文解字注》即是运用许书义例“以许证许”的成功范例。《周礼汉读考》也是归纳义例的经典之作。该书为汉儒经注义例的专书考证,抽绎《周礼》经注,通过许慎《说文》中“读若”标音法与《周礼注》中发疑正读的比对分析,归纳出三种义例:“汉人作注,于字发疑正读,其例有三:一曰读如、读若,二曰读为、读曰,三曰当为。”^[6]段玉裁无论是研究《说文解字》等小学经典、诗书礼等经书,还是研究《文选》等文学经典,均秉持还原古音、古义、古说的理念,通过具体的时代语境还原解说者的原意,汉人的归汉,唐人的归唐,“还许于许,还郑于郑”,体现出良好的历史观念。

其独特的学术个性,还体现在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等方面。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一日,年已78岁的

[1]《娱亲雅言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八,第184-185页。

[2]《潜研堂文集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八,第179-180页。

[3]《与阮芸台书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三,第51-52页。

[4]《顾千里集》卷十七《礼记考异跋》:“毋改易其本来,不校之谓也;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,校之之谓也。”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265页。

[5]张舜徽: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第二编第四章第一节“不可再走过去藏书家们校书的老路”,谈到有“为藏书而校书”、“为刻书而校书”。〔昆明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,第148页。段氏主要为解经而校书,为区别于藏书家、出版家或专门代为校书者,故此强调其学问家身份。

[6]《周礼汉读考序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二,第24页。

段玉裁为弟子沈涛撰《十经斋记》作序说：“昔人并《左氏》于经，合集为十三经，其意善矣。愚谓当广之为二十一经，《礼》益以《大戴礼》，《春秋》益以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《周礼》‘六艺’之书数，《尔雅》未足当之也，取《说文解字》、《九章算经》、《周髀算经》以益之，庶学者诵习佩服既久，于训诂名物制度之昭显，民情物理之隐微无不瞭然，无道学之名而有其实。余持此论久矣。”^[1]段氏欲广十三经为二十一经，所增八书中有《九章算经》、《周髀算经》两经是数学书，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。此序还论及六经宗旨与宋儒之异，主张“纬不可废”，并重视“训诂、制度、名物、民情、物理”。李建国认为：“这样，段氏的经学横跨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两大界域，纵贯两千余年历史文化，突破旧经学的樊篱，扩大了经学研究范围。‘无道学之名而有道学之实’，正是段氏晚年经学思想的升华及新经学的构想和期许。”^[2]陈居渊《汉学更新运动研究——清代学术新论》第五章《汉学的更新运动》第三节《重新诠释实事求是》说：“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，儒家学说仍起着指导性的作用，然而‘儒者之学，务在穷经，然末有不习数学而能通经者’的时代要求，深化了汉学家对知识与价值，特别是对传统经学的重新审视，尽管最终未能走出传统注释的旧模式，但是典型地反映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汉学研究的变迁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阮元、凌廷堪、焦循等人的科学‘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’的思想，实可视为丰富了‘实事求是’的内涵，成为汉学在跨入近代‘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’转折点上的一次质变。”^[3]段玉裁对扩十三经为二十一经之说，正可印证和补充陈氏之说。

三、独特的学术实践

任何一部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其作者心血劳作的结晶，历三十年而成的《说文解字注》可谓呕心沥血之作。段氏一生并不顺畅，其“铁骨支贫”的人格魅力、视学术为生命的学术实践，是其取得独创性、领先性的重要保障。据段氏族谱《段氏家乘》等资料可知，段玉裁祖孙数代都是读书人，属耕读人家。段玉裁在《先妣梳几铭》中自称“吾家故贫甚”，祖、父均做村塾老师，“授徒为生”^[4]。他的母亲史氏也出生于读书人家，18岁嫁入段家，“性孝谨，肯勤苦”；他的父亲段世续设馆在外，“孺人仰事翁姑，俯育儿女，苦心劳力，足称贤淑。”^[5]段玉裁的祖父母段文夫妇两日内接踵病逝，家庭贫困，史氏勉力帮助丈夫办理丧葬，以致劳累成疾，于乾隆十六年病逝，才39岁。家中没有佣人，家事均由其母操劳，积劳成疾而病故。其祖父段文留下“不耕砚田无乐事，不撑铁骨莫支贫”的祖训，段氏自幼铭记，博览群书，奋进不止。其从小乐学、中年辞官、晚年抱病治学等等，都是明显的表现。

段玉裁治学，重视个人品德的养成。段玉裁在《说荷》一文的结尾处写道：“其茎类君子之直立，其叶有容而不留物，风雨冯凌而不沈溺，枯悴而不飘扬，尤为可贵者也，是以《尔雅》统名之曰荷。”^[6]强调“君子之直立”，并以此自励。段玉裁出仕从政，与众不同。关于他在富顺县的情况，罗继祖《段懋堂先生年谱》记载：“在富顺任。县于川南最剧，号难治。是年二月，金川平，民气和乐，挽输不劳，风雨既时，年谷倍登，盗寝讼简，先生乃能以余力成《诗经小学》三十卷。又拟作《书经小学》、《说文考证》、《古韵十七部表》诸书。所居西湖楼，一灯荧然，人皆知为县尹读书处也。”^[7]富顺县，今属四川自贡市。而历史上自贡只是富顺下属单位。自贡素有“千年盐都”美称，因盐业的鼎盛“富庶甲于蜀中”，被誉为

[1][4]《经韵楼集》卷九，第224-225页，第213-214页。

[2]《段玉裁的经学进路》，载《宏德学刊》第五辑，第64页。

[3][南京]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35页。

[5]段世续撰：《诒赠孺人史氏传》，载清段潜源纂《段氏家乘》卷十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。

[6]《经韵楼集》卷五，第102-103页。

[7]上虞罗氏墨缘堂1934年石印本，又见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108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“川省精华之地”。他处理公务之暇,挑灯夜读,刻苦治学。最后,段玉裁为父亲养老,托称有病辞官回家^[1]。从此专心治学,写出许多传世的学术著作,终成一代学术大师。

任何学者都可能会遇到治生与治学、为人与为己、研究与创作的冲突问题。清代章学诚曾说:“或有遇不遇者……盖知非学之难,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……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,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。”^[2]感叹读书人可以辨明学术之当与否,却不一定能实现其学术之用与否。从其个人经历与对龚自珍的教导来看,段玉裁努力保持世俗与神圣、生活与治学的一种平衡,治学带有一些重经史之学、“经世致用”而轻辞章之学的倾向。他在《怀人馆词序》中回忆自己年轻时喜爱词,而先君子告诫他“是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,为之愈工,去道且愈远”,以后五十年不谈词,“锐意于经史之学”^[3]。段玉裁这一思想倾向,与其师戴震轻视辞章之学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。晚年的段玉裁,对其外孙龚自珍(1792-1841)的教育也是重视经史之学,而蔑视填词之类的文学创作。他借万季野告诫方苞“勿读无益之书,勿作无用之文”之语,告诫龚自珍:“博闻强记,多识畜德,努力为名儒,为名臣,勿愿为名士。何谓有用之书?经史是也。”^[4]龚自珍在经学根底方面受段玉裁影响较大,而又自成一派,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,留下了“九州生气恃风雷,万马齐喑究可哀。我劝天公重抖擞,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“一箫一剑平生意,负尽狂名十五年”,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等名诗名句。即便是出仕为官,担任十年县令,他也是倡学兴教、表彰忠烈、读书治学,进而提出“吏不扰民,而民自不扰吏耳”的观点^[5]。时人孔继涵根据段玉裁的言行,曾赞誉他“官况清卓”^[6]。

大师的精神品格是学术的灵魂,重在科学与求真求实。吾爱吾师,吾更爱真理。这一点在段玉裁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其师戴震也研究古韵,认为段氏“尤侯”两韵可以不用分,段玉裁则在《寄戴东原先生书》中明确指出:“先生曾言尤侯两韵可无用分。玉裁考周秦汉初之文,侯与尤相近而必独用。”“先生又言顾亭林平仄通押之说未为非。所定四声,似更张大甚。玉裁按,今四声不同古,犹古部分不同今。抽绎《遗经雅记》,差可信其非妄。以上三者皆不敢为苟同之论,惟求研审音韵之真而已。”^[7]不作“苟同”之同,并因有《诗经韵谱》《群经韵谱》为据,针锋相对。他不因戴震近而恭维之,也不因江永远而贬抑之;不因戴震为其师而唯诺之,也不因郑玄古远而迷信之。这种理论交锋,直言不讳,以材料为依据,严谨求实的研究态度和对事不对人的学者风格,是段氏独特的学术实践,充分展示出他的学术个性,也是一位大师取得独创性成果的必备素质。

综上所述,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,是需要无数的具有文化印记的标志物和代表性学者来承载的,段玉裁及其著作《说文解字注》等垂范千古,启迪后学,足以当之。而段玉裁作为乾嘉代表性学者,既有时代的印记以及与同时代学者共同的特点,又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文化理念和独特的实践活动。只有客观研讨其学术成果的独创性,实事求是地说明其学术文化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,揭示其鲜明的学术个性,才能触及这位伟大学者取得独创性成果的真正原因,并使后人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。

〔责任编辑:平 啸〕

[1]《经韵楼集》卷八《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》:“四十六,因先君子已年过七十,请终养,未合例,遂引疾归,趋侍二十余年。癸亥,先君子见背。”第185-187页。

[2]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·感遇》,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5年版,第326-327页。

[3]《经韵楼集》卷九,第222-223页。

[4]《与外孙龚自珍札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九,第222页。

[5]见《书富顺县志后》,《经韵楼集》卷九,第228-229页。

[6]原见孔氏《与段茂堂等十一札》,附于段氏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后,参见《段玉裁年谱长编》,第149页。

[7]《寄戴东原先生书》,附于《说文解字注》。